

时代的回声

郭超人

浙江人民出版社



SHI DAI DE HUI SHENG

时代的回声

郭超人

浙江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刘振华
封面设计 邝文龙

时代的回声

郭超人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杭州武林路125号)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杭州环城北路天水桥堍)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5.125 插页6 字数350,000 印数0,001—1,000
1986年4月第1版 1986年4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10103·409 定 价: 2.20 元

攀 登

（代 序）

有一种鹰，叫高山鹰。它在海拔八千米以上的高空翱翔。极度的寒冷挤压着它，强劲的飓风撕扯着它，但它毫不畏惧，凭借自己宽大的羽翼搏击。

在被一些外国人称作“连飞鸟也无法越过”的珠穆朗玛峰的上空，有这种鹰。当地人叫它“神鹰”。之所以说它“神”大约是赞美它立志的高远，奋进的不息。勇敢的攀登者见过这种鹰，记者郭超人也见过这种鹰。当时，他二十五岁。

鹰，是一种象征。它象征理想，象征意志，也象征力量。

一九六〇年三月二十八日下午，郭超人随登山队侦察组登上了珠穆朗玛峰海拔6,600米的北坳冰墙下，叩响了“世界最高峰的大门”。他透过迷蒙的风雪，目击侦察组沿着险峻的冰坡向上攀登。这时他第一次看到了在雪雾拥抱着的高峰之巅，几只巨鹰在顶峰盘旋——勇敢的高山鹰！

郭超人是首次报道了中国登山队成功地把红旗插上地球之巅的记者，也是第一个登上海拔6,600米高度的中国文字记者。

高度是登山运动员征服的目标之一。如果说,8,000米以上的高度曾被公认为登山活动的“极限”的话,那么,6,600米高度对于记者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

郭超人三月初接受采访任务,从藏北来到珠峰海拔5,000多米的登山队大本营。登山前的气压仓实验证明,人在,6000米高度的稀薄空气中,心律失调,头晕出汗;到了8,000米高度以上,智力反应迟缓以至失常。而珠峰的实际情况远比气压仓里复杂、凶险。高度,考验着人的生理机能,更考验着人的意志。郭超人面临着几种选择:他可以守株待兔,依靠事后采访等间接材料写作;他可以只发消息,不发费时费力的通讯,减少发稿量;他也可以凭借现成的死资料来写活的事实。郭超人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一条最难攀登的路。当有一种力量推动他翱翔的时候,他决不爬行。

郭超人和登山队朝夕相处八十天。为了等待“周期性”好天气的到来,从三月到五月,登山队在珠峰营地守候了两个月。人们期待那个关键性的、伟大的时刻早一点到来。

窒闷的空气、多变的气候、零下三、四十度的严寒,使郭超人感到极度疲劳。他心脏本不强健,一进山就开始胸闷、浮肿了。高山反应给采访和写作造成很大的困难。郭超人的情绪始终很亢奋。他参加了两次适应性行军,身背二十五斤到三十斤重的背包,脚登七斤多重的登山靴,手扶冰镐,在漫长的冰川上摸索着前进。随着高度的增加,每前进一步都意味着跨越与开拓,意味着生与死的搏斗。在海拔6,400米营地,登山队长史占春告诉记者们,侦察组明天突击北坳,为大队开辟道路。这场战斗将决定整个登山计划的命运,记者应当了解它,将来才能更好地报道它。但是他不得不代表党委宣布,只能有一名记者去观察战斗,其余的记者撤回大本营。郭超人幸运地被选中了。

观察点设在海拔6,600米。左边是珠峰主峰,右侧是北峰的一角。飓风在两峰之间的开阔地带狂奔,撞击着岩石,又暴躁地把地面的积雪成团地抛向几十米高空。风雪从四面八方扑来。从北京时间上午11时至夜里11时30分,郭超人和观察组的同志通过望远镜密切注视着侦察组攀登北坳上端的最后一道冰坡。当他看到在十二级大风中摇曳着双翅高飞的鹰,看到侦察队员的身影变成了小黑点,渐渐地远逝,越移越高的时候,他流泪了。他的心中涌动着崇高的热流——为祖国和人民奋进不息,勇敢献身的感情,涌动着真正男子汉的激情——英雄主义。他体验到了攀登的艰难,产生了只有在严酷的环境中,在征服了大自然之后才会有粗犷豪情。在这里他写下了热情奔放的观察笔记。

生活就是这样,只有在你感受到它的时候,才能在无尽的平凡之中捕捉到伟大的瞬间。当郭超人在海拔6,400米高度的雪坡上目睹了二十几年前丧生的英国登山者之后,他感受很深。当他披露了这一事实,在国外舆论界引起强烈的反响时,作为记者,作为中国人,他是自豪的。当然,这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发现。他很清楚,伟大的时刻也许只是一瞬间,而这一瞬间连接的却是一条漫长的、艰苦奋斗的道路。他体验,他观察,他思索,他写作。他事先阅读了大量有关珠峰以及世界登山史方面的资料,坚持每天记“登山日记”,作观察笔记。十五万余字的日记,记下了一个壮举产生的全过程。如果满足于发一两条消息,如果以身体不适和工作环境的恶劣而放任自己,郭超人没有必要做这种长期的、细致的准备工作。不,他从不愿一般化地工作和生活。活着就应该创造。他要揭示攀登的奥秘,他要展现登山队员“无高不可攀”的英雄气概。他生命的振幅在加大,他也要去震动别人。他苦苦地进行构思。四月二十六日夜十二时,郭超人提前写完通讯《红旗插上珠穆朗玛峰》的导语和第一节。凌晨一时,他接着

写连载通讯《珠穆朗玛的日日夜夜》，当他写完第二节时，天已大亮。冰川又在阳光下烁着奇丽的色彩。

这一时刻终于来到了。五月二十四日，登山队向珠穆朗玛顶峰发起冲击。从二十四日到二十七日，这是激动不安，充满希冀与渴望的日子。大本营的灯光彻夜不熄。三十一日下午一时许，登山英雄返回大本营，锣鼓声、鞭炮声惊动了缄默亿万年的绒布河谷。郭超人开始进行参加工作以来最紧张、最困难的一次采访：热烈的气氛、兴奋的情绪、过度的疲倦，使登山队员不能静下心来接受采访；因为冻伤，登山队员需要即刻送到二百里远的日喀则去就医。采访时间被压缩到尽可能少的程度。郭超人利用他们边就餐，边治疗的短暂间隙，见缝插针地进行对话。这是一种特殊的对话，就象朋友间轻松的闲聊一样。记者提出了几十个问题，简洁、明确、直截了当，回答也是具体、准确、一目了然。一丝不苟的对话，没有一点浪漫气息。为了这两小时的采访，郭超人事前花费了成倍的时间，反复研究已经掌握的情况，拟订了使登山队员不费思索和气力即能回答，又可以了解到主要事实和细节的最佳对话方案。于是，在几十个短句中，蕴含了英雄行为的全部激情和主要内容。当它们转化为文字，成为《红旗插上珠穆朗玛峰》最后一节“英雄登上地球之巅”的一部分时，它搏动着时代的脉跳，勃发着中国人民无坚不可摧，无高不可攀的英雄气概：

“是什么原因使得这些年轻的中国登山队员仅仅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就突破了人类登山史上几十年来没能突破的最复杂的难关呢？

这正是中国登山队队长史占春所说的：‘因为我们有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有强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和全国人民的支持。这些是我们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力量的源泉。因为我们有着一

颗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的赤诚之心，因而我们能够做到资本主义国家所不能做到的事。’

是的，答案非常清楚：因为我们是高举共产主义革命旗帜的英雄的中国人民！”

一九六〇年——困难，然而奋发的年代。

在人迹罕至的高山上，生命的节奏放慢了。人们不能象在平原那样跑跑跳跳，大声说笑打闹。在这里似乎只有慢，才能保持和积蓄力量。但是积蓄总是为了最后的爆发。生活是这样，工作也是这样。五月二十五日黎明，红旗插上珠穆朗玛峰，二十七日零点三十分，郭超人通过无线电发报机收到高山营地传递过来的喜讯。几乎就在同时，他向北京发出了消息。珠穆朗玛与北京的电波频频不断：二十九日，郭超人发出二十九名登山运动员登上被西方称为“白色死亡线”八千米以上高度的消息，同时电发了一万五千字的长篇通讯《珠穆朗玛的日日夜夜》；三十一日，他又电发了两万五千余字的长篇通讯《红旗插上珠穆朗玛峰》。在短短的十多天里，郭超人发稿五万余字。

当人们回顾困难时期中国人民的精神风貌的时候，必然要提到攀登珠穆朗玛峰；而提到攀登珠峰又自然会想到记者郭超人。但是又有多少人能知道，当郭超人完成《英雄登上地球之巅》最后一节时，笔已重似千钧了，他耳鸣眼花，胸闷气短，字迹在眼前跳动。十几个昼夜的连续工作，难于适应的高山生活，一点点地在消耗着他的体力。他浑身浮肿，眼睛肿得眯成一条缝。他是用一只手撑开眼皮，另一只手完成写作的。

四年以后，郭超人又参加了征服希夏邦玛峰的报道，写了五万余字的长篇通讯。时隔四年，他的写作技巧日臻完美，但是，他无法忘却珠穆朗玛峰的日日夜夜——在世界最高峰上的攀登。

二

一个人成功了。有人偏重于对他机遇的分析，有人偏重于对道德的分析，也有人偏重于对气质的分析。至今回顾，郭超人仍然感谢组织在他一生中的最美好的年华里给予他的多次好机会，让他参加了西藏民主革命的伟大斗争，参加攀登珠穆朗玛峰，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以及征服世界最后一座未被征服的八千米高峰希夏邦玛峰的报道工作。记者渴求什么呢？不就是希望冲进生活的激流，描绘那汹涌的大涛，耀眼的浪花，江河奔腾而下的雄伟气势吗？这的确不是唾手可得的机会有许多人羡慕郭超人的好运气。然而，当机会平等地出现在人们的面前时，却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捉住它。它偏爱那些果敢的，有了充分准备的人。而大的成就，又往往是无数小成就积累之后的爆发。

郭超人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一九五六届毕业生。他学业成绩优秀，不过，他不循规蹈矩。他用于新闻专业学习的时间不多，经常溜到外系去听哲学、历史、文学课。郭超人始终认为，对于一个记者，他的思想理论水平，他对于生活的观察和判断能力，远比他的新闻写作技巧更重要。记者的一切活动都是在一定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支配下进行的，而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又是建立在广博知识的基础之上的。有了正确的观点，有了丰富的知识，而后才有比较，有分析，有发现。北大是所综合性的大学，他不失时机地利用了这有利条件。新闻系有的老师不了解他的用意，耽心他过多地听外系的课会影响学业。期终考试抽签回答问题，老师有意从严考考他。他的第一次答辩老师已相当满意，却还是让他再抽一次签。郭超人对老师说：干脆，我把您出的试题都答一遍吧。郭超人的话略带了些调皮，而更多的是自信。对学习、生活，他充满了热情和进取精神。和在蓝球场、排

球场上一样，他是进攻意识很强的队员。

郭超人也很浪漫。他的神思往往超越学校生活的狭小范围，在天地间遨游。他广泛地涉猎书籍，喜欢阅读那些反映社会风情的游记，渴求着探索与创造。在这类书中，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也深深地刺激了他的感情的，是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著的《亚洲腹地旅行记》。这部游记用相当大的篇幅为旧西藏揭开了它的面纱——那遥远、神秘的土地。

二十年代，斯文赫定只身一人在中亚细亚探险寻胜。他跋涉过波斯广漠，亦曾攀登过海拔6,000米的高峰。他探险生涯四十年，写了一系列探险记，风靡西方青年。郭超人钦佩他的冒险精神、胆量和毅力，记者，也应有“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精神。但是，斯文赫定囿于对时代与阶级的局限，带着明显的民族偏见，着力渲染西藏的荒蛮和落后，凝滞和阴暗。似乎它还只是一具巨大的躯壳，既无生命，又无多大的希望。郭超人感到屈辱。在任何时候，一个民族总有他自己的灵魂和脊梁。

毕业分配时，大部分同学留在大城市。郭超人坚决要求到西藏去当记者。一些人不理解他，认为这不过是热血青年一时的冲动。而郭超人呢？也的确是有一种冲动。他要自己写就一部《亚洲腹地新风录》，真实地再现西藏的变革，西藏的新生，用事实的报道改变西藏在世界的形象。

以后，当郭超人超越了斯文赫定的登山高度时，他以中国记者的豪情批评了斯文赫定面对无限空间时的那种“虚无缥缈的超自然感”和孤独感；当郭超人穿越过斯文赫定望而却步，称之为“不毛之地”的藏北湖群地带时，他以中国记者的激情，诗情画意般地描绘了那里天鹅翩跹起舞的夏，雪原无垠的冬。他把读者带入谜一样的藏北，让他们细细地听车轮轧过湖面积雪时发出的悦耳声响。在《羌塘两千里》这组通讯结集出版时，郭超人特意

写了这么一段话：

“早在本世纪初，世界闻名的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就到过藏北的边缘地带，并写过一部畅销书叫《亚洲腹地旅行记》。尽管这个‘欧洲的侦探’在当时已感到亚洲人民（包括西藏人民）‘在冬眠似的躺了几百年之后，已处在一种觉醒的状态中’，但他仍然带着一种难以逾越的局限性描写过‘藏北可怕的冬天’，甚至把自己走过的这段旅程称为‘死亡之路’。半个世纪之后，我来到藏北，恰好在隆冬季节，然而摆在我眼前的却是一个富饶壮丽、生机勃勃的世界，连那‘可怕’的漫天飞雪也给人以豪迈、清新的感受……”

与内地大城市相比，西藏地区的新闻环境差，似乎不利于记者施展才能。郭超人不这么看。从新闻报道的角度分析，西藏是一块未被认识和开垦的处女地，它陌生而又神秘。外界想了解它，西藏人也想重新认识它，这就使记者有了自由驰骋的广阔天地。记者应当敢于另辟蹊径，到很少人垦荒的地方和领域去建立自己的事业。郭超人在西藏开创了自己的事业，他呆了整整十四年。

郭超人曾遍游西藏。他经常骑马或驱牛，与一个藏语翻译相伴到基层去采访。他攀援过绝壁，也曾连人带马滚下深谷，几乎丧生。他到过长期与外界隔绝的西藏农奴制度政权的流放地准巴山谷，还在原始林莽中追踪过传说中的雪人。西藏平叛以前，新闻报道不能直接触及社会的根本问题，郭超人从另一个角度选择了突破口。他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去讴歌西藏人民的勇敢勤劳，讴歌祖国西藏的富饶壮丽。

生活给予人们的，往往比人们所能认识的多得多。认识生活，成为一个很长的过程。

一九五七年冬天，郭超人穿过冰冻的峡谷、山峰和草地，探访了鲜为人知的西藏文化古城萨迦。萨迦用出人意料的辉煌迎接

了他：宏伟的庙宇群；神彩各异的数万尊佛像；世上稀有的古老经书“贝叶经”（用黑漆在经过加工的热带树叶上写成）；除敦煌外，尚无发现存留的大量宋元明以来的汉文“写经”和活字印刷的经书。他惊喜异常，赞叹萨迦是“我国第二敦煌”。——生活，向他展示了人民的智慧与力量，展示了美。

不久，郭超人路过江孜地区一座大庄园去采访。日将西落，庄园前的两根粗木桩上捆绑着祖孙（女）二人，藏兵正用皮鞭狠狠地抽他们赤裸的脊背。民主改革以前，入藏的解放军和工作人员不能直接干预地方政府事务。郭超人无法抑制自己的激愤，制止了暴行。他也知道个人的力量是渺小的，等他离开以后，祖孙二人可能会遭受到更严重的惩罚。夜深了，他久久不能入睡，挑灯记下了这件事。又有一次，他到雅鲁藏布江畔的一个小集镇采访，遇到了两个乞讨者。其中一个因为听到主人不允许听到的话，被削去双耳；另一个因为去了主人不允许去的地方，双脚的筋被割去，依靠两根木棍支撑着行走。当时，郭超人除了把自己身边仅有的一小袋酥油和糌粑送给他们以外，无法再替他们做什么了。他还不能为他们去争一席之地，也不能用笔为他们著文呐喊，这一切化作深深的激愤埋入心底。

当西藏就是这样把美与丑尖锐对立地显现在郭超人眼前时，他的感情得到升华，他开始了深沉的思索。他不满足于浮光掠影地观察西藏社会的表象，也不再书生气十足地从书本上去认识农奴制，而是扎扎实实地去搞社会调查。他解剖了“宗”、庄园、部落、家族以及农奴主、农奴和奴隶等社会细胞，积累了数十万字的材料，努力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去分析这种社会制度。三年，对于记者来说是漫长的。他耐心地等待岩浆喷发的那一天。

一九五九年春，西藏平叛与民主改革开始了，郭超人积蓄了

三年之久的感情和写作热情瞬间迸发。在一年时间里，他写了一百多篇新闻稿，有时靠昼夜苦战写成万把字的通讯、报告文学；有时坐在发报机旁，写一页发一页。他的许多稿件受到了新华社和多家报刊的好评。

一九八四年，郭超人将在西藏写的新闻通讯、散文等结集出版，取名《西藏十年间》。郭超人的青春是在西藏度过的，他的事业是在西藏建立的。他亲自参加了“一个古老的民族为完成一场伟大的历史变革所进行的曲折斗争”，用自己的笔及时、真实地再现了这个历史过程。在二十余万字的书集中，揭露西藏农奴制度的稿件，如《魔鬼的血糖》，《沉重的铁链》等只占全部篇幅的九分之一，而极大部分篇幅歌颂农奴的反抗、农奴的新生，歌颂了进藏的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当然，也有赞美西藏的富饶美丽的文章。郭超人在该书的“序”中引用了自己采访笔记中的一段话：

“要过冰雪的台原，
请找北方的羚羊。
要寻温暖的河滩，
去问南飞的大雁……”

郭超人要让读者了解西藏什么呢？是西藏的历史流向，是经过痛苦的分娩诞生的希望，是古老的民族正在搏动的巨大生命力。正如郭超人在序言中写的：“从一九五六年秋季进藏，到一九六六年夏季被迫停笔，这十年间的历史，对于我来说，短促而又漫长。”从时间上说，它“不过占我已经送走的生命的五分之一，但从它给我留下的记忆来说，却融贯着一个民族从衰败走向新生的完整过程……”郭超人实现了大学时期的诺言。

郭超人一九五六年进藏，一九五九年在西藏平叛的报道中崭露头角，实现了第一次起飞；一九六〇年征服珠穆朗玛峰的报道

中，他的声名远扬，实现了第二次起飞，成为当时我国优秀记者的代表人物之一。从第一次起飞到第二次起飞，之间间隔一年，年龄从二十四岁到二十五岁。然而，他已经站在了一块坚实的土地上，摸索到自己应该走的路。

他用全身心去拥抱西藏，拥抱生活。他是严肃的。

三

如果生活是条小溪，它温柔、平和、清澈见底；如果生活是海，它宽广、澎湃、变幻莫测。

一九七四年国庆二十五周年前夕，国务院领导同志指示要大力宣传建国以来的成就。很明显，这个指示与“四人帮”否定“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方针是针锋相对的。这是酝酿已久的一次政治较量，也是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唯心主义在中国进行斗争的一个重要回合，这场斗争还深潜在海底。

郭超人接受了任务，采写水利战线的成就。

他意识到自己在漩涡之中，正面临着一场严峻的考验。

在那恶梦一般的年代里，记者不得不每时每刻都要直接地面，对严重的政治斗争和政治抉择，有时甚至要在坚守良心与出卖良心中进行抉择。

什么是记者的良心呢？讲真理，讲真话。

然而要在一九七四年秋季——风暴和霜冻还在笼罩中国大地的时刻，讲真话难了，在报纸上讲真话就更难了。但也正因为如此，真理和真话正蕴藏着无可估量的威慑力量，只等待释放的那一天。

记者，在这场斗争中将充当什么角色？

郭超人沿着“千古成灾”，“如今矗立起浓荫覆叠的‘万里长城’”的大河两岸驱车南下，顺流而东，跑了十三个省市自治

区，行程万余里。他沿途调查了几十个不同类型的水利工程，查阅了数十万字的县志、水利资料和历史资料，积累了五、六十万字的素材。这也许是郭超人一生中难度最大，付出的心血最多的一次采访。他感到了时代的重负，产生不可遏制的拼搏意念。他要一般化地讲真理。要提炼出一个新的主题，选择一个巧妙的角度，使得文章既能勇敢地、很有气魄地讲出真理，讲出真话，又能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立于不败之地，达到预期的效果。

一个月中，郭超人置身于泥土般质朴无华的治水人群中。这人群，不是成千上万，而是他耳闻目睹的几十万。仅仅一个治淮工程，就汇集了几十万人奋战了二十个冬春。当他了解到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三亿三千万亩易涝农田，已有两亿五千万亩得到治理，当他听着老农豪迈地说着：“桥闸是自行车载来的，大坝是人的双肩挑来的”时，豪情油然而生。一个思想越来越清晰越来越牢固地在脑中盘踞：“千百年来笼罩中国大地的那种‘旱则遭地生烟，潦则民居湮没’的历史已经永去不返了，人民正在成为水的主人。”他的心中充满着无边的忠诚，他感到，真理很朴实，很单纯，它就在人民中间。人民是海，人民是大地。当他植根于人民之中时，他觉得自己和希腊神话中的巨人安泰一样，很有力量。

四十六天之后，郭超人结束了采访，站在花园口的堤岸上，看黄河东去。他反复琢磨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的一段话：“只有一个按计划生产和按计划分配的自觉性的社会生产组织，才能在社会方面把人们提升到其余动物之上，也如生产一般已在单纯生物学方面提升了他们一样。”郭超人仿佛置身于一历史长河，长河正在庄严凝重地向前迈进……

他的思想豁然开朗，一个博大而又振奋人心的主题跃然而出，这就是《驯水记》开场白中的一句话：“当劳动人民在社会

上处于被奴役的状态，在大自然面前，在水的面前也必然只能是奴隶。这是历史反复证实了的一条马克思主义的真理。”郭超人选择了这一个角度，把人与水的关系放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去考察，将中国的二十五年放在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中比较，将社会主义制度与其它社会制度相比较。他在历史与现实中驰骋纵横，巧妙地突破了前十七年这个被“四人帮”划定的禁区，从多角度、多层次地论证了人民正在成为水的主人这个“二十五年来我国水利建设上所经历的最本质的变化”。

一九七四年十月十五日，浸着郭超人心血与良苦用心的《驯水记》问世了。它以磅礴的气势，确凿的事实，无可争辩的结论成为宣传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力作，在全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各报都在显著的位置刊登。没有人敢去公开指责这篇文章，因为他们不敢公开否认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也不敢否定新中国优于旧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这个最普通的真理。

四川乐山乌龙寺有一幅对联，上联是“是谁将眼孔打开，能看穿大千世界”，下联是“到此要脚跟立定，方许进不二法门”，这幅对联讲的是佛家的世界观和佛门的理想和立场。郭超人很受启发，认为记者也应立定脚跟，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去看透大千世界。记者不是文字匠，他们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他们把这种情感转化为自己的内热，随时准备迸发。记者的使命是反映时代的脉搏和人民的呼声，他的责任是激励和鼓舞人民。正象鲁迅说的：“血管里流出的是血，水管里流出的是水。”从一九五六年参加工作以来，郭超人在攀登珠峰，中印边境反击战等报道中，屡次立功受奖，也多次受到新华社总社的表扬。他对新闻工作保持着经久不变的热情，他是真诚的。然而，他却背了二十几年走“白专道路”的包袱。他不因此而退怯。他奉信的格言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他一旦认准目标，就

百折不回，坚定地走自己的路。

一九七三年到一九七五年间，郭超人在陕西等地搞了三次大的调查。当他看到老区的群众生活贫困，大姑娘没有裤子穿，出不去家门的时候；当他目睹经济价值很高的生漆树被砍伐殆尽，盲目地修建什么“大寨田”的时候，他真动了感情，他无法让自己不闻不问不想。在三万字的《安康山区调查》中，他冒着风险揭露了农村现状，批评了农业政策中“左”的倾向。当时有个县委书记说：“这个记者胆子大，不怕坐牢。”

这就是记者的岁月——奔波的岁月，思考的岁月，面临无数种选择和无数次拚搏的岁月。

在冰峰上，登山队长史占春告诉郭超人：要反映出珠峰的风采，必须抓住三句话：“一条世界上最长的里程”、“神秘的第三极”、“飞鸟也不能越过的山峰”。

当郭超人迈着近于麻木的双腿攀登的时候，珠峰犹如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终点”，“从出发的第一秒钟开始，它矗立在你的眼前；几个小时过去了，它仍然矗立在那里。”只有在这时，郭超人真正体会了“一条世界上最长的里程”的含义。郭超人走过的，正是一条漫长而艰苦的路；愉快拌和着汗水的路；奋斗与成功的路。这条路，是党给他指引的，也是他自觉选择的。

孙晓阳

1985年夏于北京